

ZHONGGUO MIAOZU
FUSHIYANJIU

中国苗族服饰研究

中国民族博物馆 编


民族出版社

ZHONGGUOMIAOZUFUSHIYANJIU

中国苗族服饰研究

中国民族博物馆 编

民族出版社



中国苗族服饰

研究

中国民族研究所编

民族出版社

CHINA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中国苗族服饰研究

张永发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苗族服饰研究/张永发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9

ISBN 7-105-06495-1

I. 中... II. 张... III. 苗族—服饰—文集
IV. TS941.742.8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783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中国苗族服饰研究》编委会

主 编：张永发

副主编：贾守成 何兆伯

韦荣慧（执行）

杨华山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坛 们发延 朱 宏 朱 伟

吴玉喜 李金希 李德涛 殷 林

资料搜集整理：

金玉兰 李艳敏 翟跃飞 白 英

郭莉莉 韦丽丽 张荣德

目 录

文化变迁与苗族服饰的转型·····	田茂军 (1)
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比较研究·····	杨鹂国 (13)
苗族头饰概说·····	李黔滨 (22)
服饰 风格 特征·····	杨鹂国 (40)
苗族服饰图纹类型、艺术特点及美学价值 ·····	周真刚 郭智永 (55)
黔西南苗族服饰文化概论·····	杨世章 (67)
黔东南苗族妇女服饰辨析·····	吴建伟 (82)
黔南苗族服饰试论·····	丁朝北 (91)
苗族服饰分类浅谈·····	杨昌文 何晏文 (103)
浅谈贵州苗族服饰变迁·····	解 丽 (110)
揣施洞苗绣的原始思维梦魇·····	岐从文 (119)
黔东南苗族的超短裙·····	潘成义 (127)
苗族服饰美术习得与民族认同·····	章 军 (132)
浅谈凯棠一带苗族服饰刺绣艺术·····	张锦华 (141)
黄平苗族服饰试论·····	杨世章 (146)

谈苗族男性服饰美	丁朝北 (161)
黔东南苗族戳纱绣	陈默溪 (168)
苗族刺绣的历史踪迹	张泰明 (175)
苗族蜡染造型刍议	蒙甘露 (184)
苗族服饰及其美学价值	李筱竹 (193)
一部雄浑、壮美的历史画卷	何晏文 (200)
再论苗族妇女服装的类型、演变和时代	席克定 (215)
后 记	(233)

文化变迁与苗族服饰的转型

田茂军

文化变迁，首先该去关注这种变迁在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含义。这对我们深入认识文化变迁在当代的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文化变迁也涉及到与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文化冲突、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等有关的文化发展的问题。

文化为什么会变迁？它是由哪些文化因素引起的？其变迁的结果又会是怎样？这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家们所关心的问题。文化变迁与民族的发展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关系到民族文化的未来走向和价值重构，它所引起的文化变化不仅是持久的，也是深刻的；不仅涉及到物质层面，也涉及到精神层面。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文化变迁是一种普遍的规律，是文化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文化之所以处于不断变迁之中，这自然是由社会的发展变化引起的一种内在的律动。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文化变迁并不是仅仅出现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随着人们需要的变化，传统的行为和态度不断地被取代或改变着。正如没有哪个人永远不死，也没有哪种文化模式永远

不变。因此，人类学家要求理解文化变迁是怎样出现的以及为什么会出现变迁。”“关于文化变迁可以提出两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文化新特质的源泉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受到激发而接受新特质？新特质的源泉可能在社会内部也可能在社会外部。这就是说，一种新观念或新行为可能产生于社会内部，也可能是从另一个社会借取而来或由另一个社会所强加的。新观念或新行为有可能变成文化的观念或行为，得到人们广泛的接受。因为人们多少是自愿接受的，但也可能多少带有强迫性。”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在论述到物质能量与人类文化进步的关系时，从宇宙和人类发展的宏观角度对文化系统的构成作了新的理解。他认为，构成文化系统有三个重要因素，也可叫做三个亚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哲学系统）。在这三个亚系统中，技术系统是首要和基本的，它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构成；社会系统则由人际关系构成，主要有社会关系、亲缘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等等；意识形态系统则是由思想、信仰、知识构成，它们是以清晰的言语或其他符号形式表现的，其中包括神话、神学、传说、文学、哲学、科学、民间智慧及普通常识。他认为各类事物，包括宇宙、人类和文化，都可根据物质和能量的关系加以描述。因此，利用和控制能量，以使它们能为人类服务也就成为文化的首要功能。我们面临的文化，就是一种复杂的热力学和机械的系统，通过采用一定的技术装置，能量能够转化为功能。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哲学系统）既是这种技术过程的附属物，又是它的

诠释者。整个文化系统的功用就依赖于能量以及使用能量的方式。于是，他得出关于文化发展变化的结论：“像生物学层次上的系统一样，文化系统有能力发展。也就是说，获得任何能量的力量，也就是利用愈来愈多的能量的能力。因此，文化系统也像生物机体一样，进行自我繁殖和自我扩散。……文化是一条交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河流。某一特性对其他特性有作用，它们反过来又对这一特性有反作用。某些要素已陈旧过时并被淘汰，新的要素又补充进去。新的排列、组合和综合持续不断得以形成。”^① 怀特对文化所持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文化产生于文化，所以，有关文化的发展和变化的问题也应该从它自身的要素中去寻找。这里，怀特提出了促使文化发展变化的内在要素（能量）问题，这一看法难免不无孤立和片面之处，但它所包含的文化学思想却是深刻的，也是富于独创性的。

文化都是处于不断的变迁当中的，形成了所谓变迁的文化，这是从文化变迁的普遍性上说的，这种变迁的普遍性，被认为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恒定的因素，或如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伍兹所说的，“变迁是一个常数”^②，因此，它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一条最根本的法则。

文化变迁已经呈现，这种变迁持续不断，不可避免，不可阻挡。人类学家们认为，人类发明与发现是文化变迁的源泉，它们可以在一个社会内部产生也可能在外部产生。并指出导致

^① 怀特：《文化科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绪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

文化变迁是发明与发现被人们有规律地加以运用的结果。在任何时代，文化总是伴随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不过有部分人类学家在研究文化变迁时，往往把传统的与现代的分割开，将文化流程像语法学家分解一句完整的话语一样分成主谓宾结构。其实，文化是一个不可截然割裂的流程，是若干个时代累积堆砌而成的整体。近代的或当代的文化中历史的积淀，传统文化的含量很高，在广大乡村更是如此。现代文化是在传统基础上覆抹了一层现代发明与发现、观念与概念。有了文化变迁，人类文明才向前推进。文化变迁在历史上出现过这样几种情形：第一种是文化的不断扩张、丰富，累层越积越厚，犹如汇流百川的长江之水滚滚向前，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如中华汉文化。第二种是受到内部或外部压力时，接受文化移入或称涵化异质文化，融合原生文化因素，形成新的文化特征，如藏传佛教文化。第三种是受到内部或外部压力时，原生文化全部或部分调适乏力，逐渐衰微，最后消亡，如西夏文化、玛雅文明等。作为人类文明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的变迁，虽然始终离不开上衣下裳（裤）的最基本结构，这是服饰实用功利目的所决定了的。然而，作为表现苗族文化特征的装饰，代表不同时代文化特征和审美观念的款式的消失，纹饰等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中不少的款式、纹饰造型在变化过程中永远消失了，有的工艺也衰败了。文化在不断的变迁，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旧形式功能丧失了，最终也就消亡了，这就是进步中的蜕变。

进步中的蜕变是文化变迁史上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特别

在人们的工艺技术、人的身体机能方面表现突出。有人指出这是“自然人化”的结果，如纺织技术发明与发展带来的人体御寒机能比原始人下降了。汽车的发明与运用，使以车代步的都市人的步行能力与山村居民比下降了等等。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一种能力、技术的获得，必须以某一技能、某一技术的丧失为代价。只是在新的技能、技术获取或获得过程中，人们往往疏忽了另一技能、技术训练，也可能这种技术、技能不再具有使用的价值而逐渐被淘汰，最终丧失其存在。

在研究苗族服饰变迁中，青年学者杨正文指出苗族文化的中心区域的变迁速度往往比僻远的区域快，这一规律在其他非主体民族中同样适用。换句话说，非苗族聚居中心区域的群体更能保守古老的服饰造型。他进一步指出，在民族聚居区域，同样保存有古式服饰的样本，但这些古式样本往往已经成为收藏品或仪式服，在日常生活中极少穿用。造成迁出群体保守古式服饰的原因很多，除居住僻远、文化传播薄弱外，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比原居地群体更加珍视作为象征民族标志的服饰。因在受到强烈异质文化压力的时候，群体内聚需要与聚居地群体比较显得特别突出。可以发现，居住在聚居区内的苗族群体对本民族充满信心，文化意识更开放，对异质文化抱有吸纳的宽容态度。相反，人口少，居处在四面均有异质文化的群体，其民族信心减弱，对异质文化拒斥心理更强，对本民族文化更加保守。这两种状况，遭遇强劲的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前者更容易吸收和扬弃，后者或拒斥之或全盘接受之。因此，对后者而言，文化变迁往往走向极端，或保守古旧或完全

转化，原生文化走向消亡。

回到现阶段苗族服饰变迁的主题上，杨正文指出苗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迁速度加剧了，并呈现出三方面的变迁态势：（1）传统生活装的礼服化。（2）服饰材料的非本土化。（3）传统工艺技术衰落。

第一种变迁态势具体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少穿或不穿过去一直以为自豪的作为民族标志的民族服饰，取而代之的是从市场上购回的成衣。这在青年人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传统服饰仅成为人们在节日、庆典、宗教、丧葬、婚礼等仪式式上穿着的礼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装的礼服化。第二种变迁态势具体表现为：衣料、绣线、染料等大多为外地舶来品。灯心绒、平绒布不仅取代了自织的格纹布、花线布、平纹布，而且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常用布料。阴丹蓝等宽幅工业布取代传统蓝靛染的窄幅自织青色布，成为苗族女子们夏天常用的衣料。传统自缫丝、抽丝和染色的绣花用丝线也多为上海、杭州等地厂家生产的现代化纤线取代。本地自产布料、丝线等使用率大为降低，甚至逐渐消失。伴随着第二种变迁态势出现的同时，第三种变迁态势也出现了。由于成品棉纱、布坯、面料、丝线、毛线、腈纶线、化学染料及缝纫机等的大量涌入，充斥着他们的生活。传统的棉花种植、种桑养蚕、纺纱、缫丝、织布、染料种植与制剂、染布的活动减少了，过去他们赖以生存的种棉、养蚕、纺、织、染、绣等工艺逐渐衰微，以致已在部分地区消失。就是在苗族人中聚居的地区，种棉、养蚕、蓝靛种植等已不多见，苗族妇女们或购回成品纱

织成传统的格纹布、花线布，或购回丝线织成锦，或干脆购回布坯自染，染料也多为从市场购回之化学染料。相当多的地区之纺车、织机、染缸等工具已经搁之楼阁或劈成柴薪。具有精湛手艺的一代人渐渐老去，新的一代人对工艺完全陌生，以致后继无人。杨正文搜集到的村民谚言说：“挑花绣朵，50年代，人人都会；70年代，中年人会；90年代，老年人会。”^①

很明显，随着时代的变迁，苗族服饰风格已处在急剧变化、工艺处在加速衰落之中。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是其内部调适乏力？是不是苗族工艺已经没有了使用和审美的价值呢？杨正文指出，服装款式、用料、缝纫方式的改变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十分自然的。毕竟是苗族人民认同和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表现，毕竟是人们功利考虑之后的选择。新的款式有简洁方便的优点，新的布料有轻巧、柔软、透气、御寒力强等性能，缝纫机有省力快捷的效率。人们三思而后接受之，是件可喜可贺的事。然而，传统的工艺技术如织锦、刺绣、植物染料生命力并非已到尽头，弃之可惜，任之衰微甚至消亡则令人痛心。毕竟，这些传统工艺技术是经历数千年积淀的人类文明瑰宝，完全可以转化为服务于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改变是促使苗装礼服化、加速苗族工艺变迁的内部动因。这里所讲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均针对苗族群体对苗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而言。然而，对苗装价值观念、审美观的改变不是孤立的，它是苗

^① 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族社区全面社会变迁的一种现象。那么，是什么动力导致苗族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表现出这样急剧的变迁趋势呢？作者认为分析导致现代少数民族地区变迁的根本动力得从改变政治、经济结构的事件入手。首先，50 年代的土地改革、人民基层政权建立等完成了苗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一转型的结果使苗族地区比过去任何时代都置于文化传播的前沿，也使苗族地区完成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随之而来的现代教育的大发展，使人们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全新的价值观念。这一过程对苗族这样非主体民族而言是必要的，也是他们乐意接受的。自 50 年代开始的这种文化移入，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其效果开始显现，功能开始释放，表现为大批受现代学校教育的苗族已经逐渐参加到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之中，并在语言、观念、技能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60 年代初中国农村实施的生产责任制，把中国农民从集体生产活动的土地中解放出来。苗族地区的村民们同样成为他们自己生计的操持者，也真正成为他们自己劳动时间的支配者。同时，这一事件为苗族地区后来的剩余劳动力向外迁移准备了条件。90 年代初开始的市场经济，应该说是至今刺激中国乡村市场网络形成，物化商品以最快速度成为流向社会每一角落的催化剂，即使边远地区也能很快享受到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商品的便利。同时，传统的落后的手工产品也受到了冲击，特别是对传统手工纺织、服饰等手工技术的冲击。二是货币商品的冲击。市场网络已把乡村生活商品化，并加速农业产品的商品化，使人们对市场依赖性增强了。货币不仅成为市场上特殊的商品，而且也

成为人们生活中割舍不掉的特殊商品。货币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并逐渐成为衡量个人能力或家庭富裕的尺度。三是在市场经济刺激下，落后与先进迅速昭示在人们面前。产业落后地区造成劳动力过剩，产业发达地区则出现劳动力不足，导致经济产业落后社区大量劳动人口涌向经济产业发达地区。苗族社区的过剩劳动力大批地加入了全国劳动力迁移大军中。以凤凰县山江乡为例，全乡人口 12584 人，2000 年上半年统计，全乡外出打工者 4200 多人，占全乡总人口的 33%。以山江乡马鞍山村为例，全村寨 90% 的青年人外出打工，打工者主要流向浙江、两广地区。外出的民工们在接受经济发达地区提供的就业机会、工作机会的同时，逐渐接受了发达地区的价值观念。对苗族青年而言，他们接受到的这些价值观念、经济观念、时间观念及劳动观念等不仅是跨地区的而且是跨文化的。他们返乡以后对原居住社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另一方面，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增量，人们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如电影、电视、报纸等传媒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拉近了边远地区与文化中心地区、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距离，这也是加速现代苗族社区变迁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回到苗族对传统服饰价值观念的主题上。我们发现传统苗装过去的职能开始失去，或者说已经减弱，在青年人观念中尤其如此。首先，传统苗装赖以生存的社会评价系统功能已经减弱。具体表现为织、染、锉、绣等女红工艺不再是衡量女性最重要的指标。人们发现，只要能挣钱，有货币商品就能从

市场换回任何必需的生活品，包括全家衣物。只要勤劳，有能力，善持家事，把家庭的其他经济营运好，家庭富裕了，就是妇女能力的表现。由于苗族社会已经与主流社会融为一体，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已经成为他们获得一定相应社会位置或谋得更能轻松便捷的生活环境的一种重要手段。疏于传统工艺技术的教育是青年一代对传统女红生疏或技艺粗糙的直接原因。当然，这些变化是十分微妙的，有时很难把两者截然分开。其次，苗族的族群标志功能减弱。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民族平等政策宣传及相应的法律保障，社会趋于稳定，民族之间和睦相处，民族间的抗争与冲突减少，外部压力减弱，族群内聚目的不再以抗击外敌、外族为主体，使服饰族群文化标志弱化甚至消失。同时，经过长期的民族平等交往，增进了族群、亚族群间相互了解。人们的婚姻选择不再像过去一样严格地局限于亚族群内，不同民族、不同亚族群间的通婚已成平常之事，加之基层人民政权取代了过去族群、亚族群内部的社会组织结构，局限于族群或亚族群内的社会管理体系不复存在，过去那种以服饰界定婚姻范围、社会管理实施圈子的功能大大消减。虽然，传统服饰仍不失为族群或亚族群的标志，但此时仅是文化象征，不再是人们生活中非穿不可的族群符号，这是导致苗族礼服化的原因。第三，传统苗族实用功能减弱。苗装是艺术品，但它首先是生活用品，作为生活用品，要求它具有舒适、方便等性能。伴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环境的改变，人们更希望一种舒适、省时、简洁、方便的着装。这使传统苗装在长期的慢节奏生活条件下积习而成的一些缺点突出地表现